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

XIAMEN DAXUE HONGGUAN JINGJI YANJIU CONGSHU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 预测(2016年)

—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潜力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for China's Macro-economy in 2016

主 编/李文溥

副主编/陈贵富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回顾

“刘易斯拐点”的一个理论证伪

二元经济中的“不变工资”

区域增长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国地区间价格差异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税激励政策对省际技术效率的影响

政治关联、要素比价扭曲与再配置效应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中国环境污染

教育同质性婚配与家庭收入不平等

调整社保缴费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6 年: 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潜力 /
李文溥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5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41 - 6877 - 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 - 宏观经济分析 - 2016
②中国经济 - 宏观经济 - 经济预测 - 2016 IV. ①F123.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5904 号

责任编辑: 齐伟娜
责任校对: 刘 昝
责任印制: 李 鹏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6 年)

——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潜力

主 编 李文溥

副主编 陈贵富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2 印张 420000 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877 - 8 定价: 49.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com.cn)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编委会

编委主任：王洛林

编委成员：张平 曾金利 杨瑞龙 范从来
洪永淼 李文溥 龚敏 林致远

开篇心语

——写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 李文溥 •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是体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因此，说丛书，还要先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而且至今仍然——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可是，教育部却将其唯一一个命名为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基地布点于地处天涯海角，置身政治经济旋涡之外的厦门大学^①，似乎有一点不合情理。

当然，这首先是申请者的意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五系一所：经济系、财政系、金融系、统计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经济研究所，内含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财政学、统计学、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系所及其重点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是政府经济管理实践及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申请建立一个研究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与理论的研究中心，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尽管正如识者所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与规范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还有些差别，但是，在既有基础之上，通过组建这个中心，集中一支队伍，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政策实践，带动一个有85年悠久历史的学院向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体系的转轨，却是申请者的决心和期望。因此，尽管知道还有差距，需要付出的努力多多，仍然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一选择。

现在需要谈另一个方面。对于教育部而言，将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设立在哪所大学，显然有着诸多选择的可能，然而，最终选择了看似未必具有地利人和的厦门大学。此刻，愚钝的我只能找出两点理由：

^①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规则，尽管在全国各大学设立了百余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但是任何一个重点研究基地的名称都是唯一的。

1. 申请者的虔诚之心感动了上帝。自古就有民心即天心之说，作为自始参与这个中心的组建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的我认为：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申报过程及结果可以作为此说的例证之一。

2. 审时度势，反弹琵琶。显然，在北京等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可谓顺风顺水，研究者得以享受诸多便利，研究中心成功的概率自然也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下，身处政治经济中心的研究机构不免受磁场中心的引力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外地的研究机构或许因此在人所习见的劣势中显出了一点另类优势。网络时代，各种研究所需要的资讯在通都大邑和偏远小城大体都能同样获得，信息差距不断缩小，因此，尽管劣势还存在，要弥补，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在非政治经济中心，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条件，还是基本具备了。而且，远离磁力场，从学术逻辑角度阐发其观点的欲望可能更强，有可能因此形成不同的见解。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发展，以及政策实践而言，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这大概是教育部下此决心的依据之一吧。

说了这么多，还都是假说和愿望，到底实绩如何呢？一句老话：实践检验。我们的计划是：这套丛书分文集、专著、研究报告三类出版，以期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其中，文集与学术活动相联系，主要反映研究中心近期在宏观经济理论与应用方面的探索；专著是研究中心课题研究成果的系统体现；研究报告是在研究中心为社会经济重要决策提供咨询研究的成果中，选择部分兼具出版价值的刊行。我们的设想，得到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慨然提供了舞台，使构想转化为现实，在此先行谢过。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还是真正的上帝——读者。众位读者既是看官又是判官。我们希望你们能关心这套丛书，并给予严格的指正。希望在你们的关心和帮助之下，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能不负期望，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略尽绵薄之力。

市场经济是买方市场，酒香不怕巷子深是过去时代的事了。如今的图书市场也是供大于求。开篇伊始，倾吐心语，以期引起注意，虽系未能免俗之举，也是人之常情流露。书有序，大体本意如此。然吾何能，敢为丛书作序！然而，要吸引读者，仅有心愿还是不成的，关键还要做好文章。至于文章是否精彩，就敬请列位指点了。

2006年6月写于厦门大学白城

前 言 *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 6.9%，增速较上年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是过去 25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短期来看，需求疲软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论是在各个行业还是对于各类投资主体都出现普遍的减速；其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持续减缓，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张；最后，出口需求的持续疲软，以及因中国国内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导致加工贸易行业不断萎缩，抑制了出口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减速是既有供给结构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转换而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与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此外，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转变，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制约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总量与结构问题都不可偏废，改善供给结构、效率与扩大需求两手都要抓。在当前，单纯地、过分地重视降低无效供给，而不重视有效供给的扩大，不利于稳增长，有可能导致紧缩叠加，导致经济的螺旋形下滑。因此，必须根据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产生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在去过剩、过剩、无效产能的同时，扩大投资，增加新产能，扩大有效供给。用扩大有效供给的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形成社会

* 本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2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11、15JZD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90001、13JJD790025、13JJD790026、14JJD7900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及青年项目（11CJY073、13CJL017、15BJL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50322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720140021、20720151037、20720151181）、厦门大学基础科研基金项目（201322G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M560526）的资助。

总供需之间的螺旋形上升正循环，做到“以创新促增长，以需求保就业”。在供给侧，通过供给结构改革，不仅要降低无效供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需求对象及结构的变动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供给品质以及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灵活适应性。在需求侧，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同时，发挥利率市场化有效配置信贷资源的作用，使扩大的信贷资源充分满足民间投资的需要，通过有效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依照以往的体例，在第1篇中回顾和总结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政策执行的情况。

第2篇“研究和分析篇”中汇集了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过去一年里的部分研究成果。

“刘易斯拐点”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03年以来，中国沿海甚至部分内陆地区陆续出现了较明显的“民工荒”现象，代表非熟练劳动力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明显地持续上涨。在城镇，类似的“工资增速拐点”来得更早。从1998年开始，中国城镇实际工资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提高。国内部分学者利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上述工资上涨现象，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往的“劳动力过剩”时代已经结束，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将成为一种常态。“刘易斯拐点”成立与否，不仅需要大量的事实观察和经验研究，同时也需要理论上的证明。因此，第2章从社会再生产循环及社会产品实现的角度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理论研究，分别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不变劳动工资假定并结合产品市场出清进行论证。研究证明：由于只考虑劳动力市场而忽略产品市场的实现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只有当二元经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实际的劳动工资水平才能明显提高——无论是在封闭经济或开放经济条件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无论是一元经济，还是向一元经济转轨的二元经济，劳动工资都应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第3章在第2章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的工作：以英国、日本、中国为例，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二元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劳动工资变动趋势。得到的结论是：“不变工资”只是二元经济转轨的某个时段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就二元经济转轨全过程来看，劳动工资必须随着经济增长逐渐提高；它是社会产品实现的前提，否则，国内市场扩大、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及经济增长将无法实现；劳动生

产率是决定劳动工资上升的基本前提，但后者能否提高，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在机械化生产与现代工厂制度下，有组织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是实现劳动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必要条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及政府公正处理劳资关系不是对市场均衡的干扰，而是市场经济中实现劳动力与产品市场一般均衡、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经济增长的必要制度安排。

第4章试图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解释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该部分在理论上，根据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放弃了传统上将人力资本加总为一个总量的做法，将人力资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企业家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普通人力资本，三种人力资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实证上，运用2003~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和比较了不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强。地区水平上，中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强，东部地区专业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大，西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直接作用最显著。

经验研究表明，存货投资变动是引致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研究经济波动的文献却少有考虑存货投资。第5章借助于新凯恩斯模型，利用贝叶斯估计，重点讨论了存货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主要发现有：（1）存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与冲击来源息息相关。当冲击来源是需求冲击时，存货投资会平抑经济波动；当冲击来源是供给冲击时，存货投资将加剧经济波动；（2）存货投资会加大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以及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强化企业行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性；（3）在样本期内，存货投资整体上表现为加剧经济波动的作用，这意味着，造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是供给侧的冲击。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需要改变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调控思路，更加注重供给侧的调整。

第6章使用1994年1月至2010年12月中国30个省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及其构成的15类商品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对中国地区间价格差异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进行统计观察，并构建一个两地区理论模型来比较分析两种方式设定下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结果发现，货币政策的确会引起地区间价格差异，这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而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产生价格非对称性响应。理论上，这种非对称性会使得忽视地区信息仅从全国总量角度制定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福利损失。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审视一下全国总量度量的可

靠性，应该更多使用地区的信息，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价格反应差异赋予其不同的权重，以减少因非对称性带来的福利损失。

为促进技术进步，各级政府普遍运用财政科技拨款、财政贷款和贴息、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多种财税激励措施。为评估财税激励政策对于各地技术效率的影响，第7章基于2007~2011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以随机前沿模型（SFA）为基础，测算出省际技术效率；随后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探讨财税激励政策对省际技术效率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交通运输财政支出和教育财政支出对技术效率具有正效应，而科技财政支出虽对技术效率有正效应但不显著，税收对技术效率有负面影响，而这表明税收优惠对技术效率具有正向效应。

压低要素价格实现了低成本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审计后公开披露的经营数据，应用对企业层面生产函数估计的改进范式，第8章测算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引起的资源误置程度。研究发现：（1）2006年以来，企业间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了背离趋势，前者的错配程度加深，而后者整体上有所缓和。（2）对劳动要素而言，政治关联度较低的民营企业劳动力产出缺口较低，使用效率较高；基于政治关联形成的劳动力比价扭曲则加剧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中劳动力资源误置。（3）对资本要素而言，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负向扭曲，但错配趋于改善。在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高政治关联度上市公司中，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要强于低政治关联度上市公司。更换样本区间的稳健性检验支持了上述判断。

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大都忽略了隐性经济的存在及其影响。隐性经济作为制度弱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存在带来环境污染的同时，将会影响到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第9章将隐性经济活动纳入考虑，从理论上研究了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隐性经济规模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隐性经济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越高，隐性经济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现代婚姻匹配模式如何影响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正向选择匹配的婚配方式提供了解释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作用下，

中国的婚配观念由旧时的门第家庭等先赋性特征转向现代社会的教育人力资本等自致性特征，教育成为正向选择婚配方式的主要标准。随着初等教育普及化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教育正向匹配在以教育回报率为导向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马太效应，加剧了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第 10 章利用 CHIP 数据库，按照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来衡量婚姻的匹配模式，研究表明，在 1988~2008 年的 20 年间，中国婚姻市场上的正向选择匹配——教育同质性婚配方式呈加强趋势。通过构建正向选择匹配和随机匹配的基尼系数核算方法，得出正向选择婚配模式下的总体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随机婚配模式下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同质性婚配对总体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作用逐年增强。同时，若将按夫妻双方教育等级划分的每一类型视为一个层级，通过反事实实验方法，不同教育层级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示，教育同质性婚配加剧了不同教育层级间的家庭收入不平等。该部分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社会保障，倡导多元化婚配；对低教育水平家庭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其职业回报；对低收入家庭给予适当补贴等是缓解家庭收入不平等的良策。

第 11 章利用 1996~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 GMM 模型研究了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决定要因，在控制了相关解释变量的基础上首次研究了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均教育年数增加 1 年，家庭储蓄率提高 3.15 个百分点，滞后 1 期的人均教育年数增加 1 年，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 2.41 个百分点；但是比较这两个变量系数可以发现，人均教育年数的增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最终为正。实证结果还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构成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小学毕业劳动力占比增加 1%，家庭储蓄率平均下降 0.262 个百分点；初中毕业劳动力占比及其一期滞后项对储蓄率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高中毕业劳动力占比的系数为正并且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该变量的一期滞后项的系数则显著地为负，比较这两个系数可以发现，该变量的增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最终为正；大专及大专以上毕业劳动力占比增加 1%，家庭储蓄率平均提高大约 0.400 个百分点。

社保缴费率的变化会改变居民对将来收入的预期，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第 12 章基于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调整社保缴费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不论是提高现收现付制还是提高基金制下的缴费率都会降低家庭的储蓄意愿，且调整基金制下的缴费率对储蓄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调整现收现付制下缴费率的影响程度；（2）提高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率可

同时扩大家庭在年轻和老年时的消费水平，但仅在个人养老金账户收益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提高基金制缴费率才会扩大家庭两期的消费；（3）在缴费率给定的情况下，个人账户收益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距越大，家庭的储蓄意愿就越小。因此，我们建议，当前在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同时，应提高政府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的管理水平，优化投资组合、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提高养老金账户的收益率。在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适当提高基金制的缴费率，以此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并扩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进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书第3篇是“预测与政策模拟篇”，共三章。第13章是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15年春季预测报告的主体部分，第14章是2015年秋季预测报告的主体部分。这两次报告的第一部分都是对上一次预测报告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进行回顾与分析，我们在编辑本书时，另行撰写了2015年的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情况分析，并作为本书的第1章。因此第13、14章仅包括了两次报告的预测、政策模拟、政策分析与政策建议部分，以及在预测报告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第13章是2015年春季预测报告的内容。2014年，财政收入仅增长8.6%，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是，从税收收入结构看，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增速放缓，同时，得益于居民收入提高、汽车消费增长、房产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税种税基扩容和高增长，直接税保持较快增长，税收收入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值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由2010年的0.48上升到2014年的0.5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是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当前的间接税下降，主要是经济增长下滑，投资下降、产能下降的结果，单个生产或消费行为的边际税负效应并未发生变化。换言之，间接税下降不是因为边际税率下降，而是税基缩小的结果，是随经济增速变化而变化的短暂性、临时性调整。这种由于直接税、间接税增速不同导致的直接税比重上升与税制调整实现的直接税比重上升，并不是一回事。

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可转嫁性，容易将税收负担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实际上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增长。此外，间接税也不具备税收纵向公平的功能。更多地

征收与个人收入水平直接相关的税种，有利于调节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所得、缩小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消费。

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虽然会带来间接税的短期减少，但从长期看，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避免被动调整带来的税收增速持续下降风险。同时，降低间接税边际税率，在中国现有“含税价”体制设计下，将促使物价水平下降，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改善需求结构。

对比国际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目前中国的直接税比例偏低。中国的直接税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而且低于同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上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因此，中国存在较大的直接税比重提升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CQMM模型，课题组模拟分析在2012~2014年间，提高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至世界平均水平（0.63）的宏观经济效益。政策模拟设计如下：情景之一，保持税收总量不变，降低间接税，同时增加直接税，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调整至新比例。情景之二，降低间接税，同时保持直接税不变，在税收总量下降情况下，将直接税与间接税调整至新比例。在这种情景下，模拟既包含税制结构调整，又进行总量减税的宏观经济效益。模拟结果显示，调整税制结构，尤其是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将有力地促进投资，扩大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

课题组认为，在现阶段，适度降低间接税，进而适度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下一个阶段再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思路之一。

因此，课题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2015年应当把总量减税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选项，主动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2）加快“营改增”。（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行政费用支出，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4）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强化权力监督。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并非为了减税而减税，而是要促使生产与消费，在资源占用和消耗上，各付各的账，消除交叉补贴。同时，完善地方税体系，将房地产税、消费税、资源税、契税等财产行为类税目作为地方税的重要来源，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实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夯实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种更好更有效配置

资源的方式，一种更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也是一种更有利于老百姓参与公共管理、监督政府行为的方式，一种更有利于培养地方自治、自主管理、公民意识的方式。

第 14 章是 2015 年秋季预测报告的内容。2015 年上半年，采矿业、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投资增速的下滑，直接抑制了投资的增长；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出口增长低迷；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在这些经济的下行压力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增长 7.0%，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0.42 个百分点，几乎是 2000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基于 CQMM 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2015 年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的压力，但经济增长率有望实现 7.0% 的政策目标，预计全年 GDP 增速为 7.10%。比 2014 年小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CPI 预计上涨 1.62%，通货膨胀率将维持低位稳定。2015 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 1.87%，比上年下降 3.70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降至 -11.47%，比上年大幅下滑 12.2 个百分点。净出口占 GDP 的比重维持在 2.47% 的水平。2015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 11.21%，比 2014 年下降 3.99 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10.07%，比 2014 年下降 1.90 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以及不利于非国有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4 年以来开始实施的定向扩张政策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及小微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我们认为，完成利率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新增信贷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民间投资扩张的需求，继而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 CQMM，课题组做了如下的模拟：假如在 2012 ~ 2014 年期间，取消了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从而导致存贷款利差缩小：如 2012 年中国存贷款利差为 3.06 个百分点，假定从 2012 年一季度起到 2014 年四季度末（共 12 个季度的时间），存贷款利差因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逐步下降至 1.53 百分点。那么，模拟结果表明，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后，模拟期内贷款利率不会大幅提高。一方面，存贷款利差的缩小会降低投资增速，小幅拉低 GDP 增速；另一方面，存款利率的提高可通过财富效应提高消费增速，继而提高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此外，存款利率的提高可更快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有利于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当前在控制好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推进并完成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是挖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力的关键。“十三五”期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拓宽私人投资空间，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中国制造2050》以及区域规划的调整措施，将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将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也将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负面清单管理的落实等都将从长期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在今后5~10年保持稳定增长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条件。

课题组基于生产函数法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表明，201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91%的水平；在“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潜在增长率平均可维持在6.79%的水平。虽然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还可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但是，课题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首先，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空间，在“十三五”期间让混合经济的比重比2014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达到34.1%，那么，潜在增长率预计可以比基准模型提高0.03个百分点，平均达到6.82%的水平。其次，在“十三五”期间，如果加快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使三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从2014年的56.2%提高到2020年的70.0%；同时，快速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让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按每年5.0%的速度提高，那么，潜在增长率预计可以比基准模型提高0.01个百分点，平均达到6.8%。最后，如果在“十三五”期间使中国劳动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4年的9.89年达到2020年的11.2年，那么，潜在增长率预计可以比基准模型提高0.34个百分点，平均达到7.13%的水平。

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国内制造业过剩产能以及房地产业过剩供给的压力，但是，对经济增长率的下行趋势却不应过度悲观，经济增长出现断崖式下滑的可能性依然非常低。因而当前稳增长的措施应避免过去纯粹重数量扩张、轻结构调整的政策。以实现7%的增速为目标，通过稳定、连续和灵活的宏观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为提升将来潜在增长创造条件。

在今后一段时期，投资的扩张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增长动力，但

只有通过促进民间投资的扩张，才能确保投资效率的提高。如何在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通过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占比，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来快速提高三产的劳动生产率，是今后1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能否确保一个稳定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关键问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加快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促进人力资本的扩大，这是在长期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第15章收录了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分别于2015年1月和7月联合开展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其分析。

本书编辑过程中，中心的学术秘书崔庆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深表感谢。

目 录

Contents

第1篇 回顾篇

第1章 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回顾 / 3

 第1节 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情况分析 / 3

 第2节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执行情况 / 18

第2篇 研究与分析篇

第2章 “刘易斯拐点”的一个理论证伪——基于产品市场的视角 / 27

 第1节 引言 / 27

 第2节 基准模型 / 32

 第3节 封闭经济 / 35

 第4节 开放经济 / 39

 第5节 结论 / 43

 参考文献 / 45

第3章 二元经济中的“不变工资”——经济史角度的分析 / 47

 第1节 引言 / 47

 第2节 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 / 49

 第3节 国内需求 / 55

 第4节 劳动工资增长停滞的背后 / 63

第5节 结论 / 68

参考文献 / 69

第4章 区域增长差异的原因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视角 / 71

第1节 引言 / 71

第2节 模型建立 / 72

第3节 实证分析 / 74

第4节 结论与建议 / 80

参考文献 / 81

第5章 存货投资：经济波动的缓冲器，抑或加速器

——基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检验 / 84

第1节 引言 / 84

第2节 理论模型 / 86

第3节 参数校准与估计 / 94

第4节 动态分析 / 98

第5节 简要结论 / 103

参考文献 / 104

第6章 中国地区间价格差异与货币政策有关吗 / 106

第1节 引言 / 106

第2节 中国地区间价格差异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
统计观察 / 108

第3节 货币政策引起地区间价格差异的原因 / 113

第4节 不同方式设定下的货币政策的福利分析 / 117

第5节 结论与政策启示 / 122

参考文献 / 122

第7章 财税激励政策对省际技术效率的影响 / 124

第1节 引言 / 124

第2节 省际技术效率的测算 / 125

第3节 财政激励政策对省际技术效率的影响 / 129

第4节 结论 / 132

参考文献 / 132